

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

邢公皖

提 要

中国北方史前时期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吸收了与古东夷族有关的山东龙山文化所形成的新文化；其后又吸收了其他地区性文化，例如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而形成的夏时文化；殷商又继承发展之。文化上的融合反映了部族上和语言上的融合。当甲骨文出现的时候，“汉语”的初始形式早已出现，但方言芜杂，可以想见，殷商渐次加以统一。周王朝“雅言”的出现，说明“汉语”已有定型。一部分没有跟夏人融合的东夷人，在甲骨文字通行以前逐渐向南方和西南方迁徙。他们的语言后来发展为侗台语族。当汉语形成后，一部分说汉语的人也逐渐向南方迁徙，约在唐宋时代先后到达福建与广东。

汉语和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藏语的主要流行区——西藏地区，史前有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有新石器遗址多处，证明我国先民从远古就已经在这一地区生活。在新石器晚期的遗存中还发现彩陶罐，显示了史前时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此外，藏族还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我们已知藏族移居云南为时很晚，但与藏族为近亲的各族入滇时间不一定很晚。可以设想，有一个与藏族有关的古民族在远古从华北平原向西南方向迁徙，并且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为藏缅语族。

苗族史前时期居住于长江下游地区，曾经联合很多部落北上与炎帝族、黄帝族作战。失败后，退回江淮荆州，并向南方和西南方迁徙。其迁移方向与侗台、藏缅语各族相同。

一 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汉藏系语言史研究

1.1 解决汉藏系语言史上的问题可以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上得到启发

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学从田野发掘到分析研究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我国的语言学，不论是汉语研究还是各兄弟民族语言研究，也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由于我国的语种多，各语种流行区域广阔，方言复杂，所以有三个关键性问题至今还没有充分解决：第一，各种语言的历史至今还不够明确；第二，许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很不够，语言间的关系还不清楚；第三，从古代语言的历史演变来判断各语系中的语言

是否同源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严学窘1983引李方桂先生意见）。想彻底解决这些涉及语言历史的问题，只有对语言本身去进行调查研究，但是语言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交际工具，那么我们能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上得到一些启发呢？我想是可以的。

一般认为，猿人掌握了两个征服自然界的武器：一个是石器，一个是火。但是仅仅这样说，那是不够的；应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武器，那就是语言。但是如果把语言仅仅理解为有意义的发音，那是不够的；因为其他的动物也能发出有意义的声音来，只是音义之间的连结关系十分原始而已。因此必须把语言的发音和非语言的发音区别开来。语言，不管它怎么简单，应该限制为有音位系统、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的一种发音动作。换句话说，音义之间的关系有“语法”来连结。所以人不仅仅是能说话的动物，而且是有“语法”的动物（Palmen, 1971）。那么出现于四、五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山洞里的“中国猿人”当然是有他们的语言的，而且这种语言已经使用一百多万年了^①。

人类为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在原始阶段只能用感觉器官接受自然信息，比如接受了火的作用这一系列的信息，从而开始了火的利用等等。但是，“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很快就能认识到有必要把每一个个体的信息感受连结为群体的信息感受，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恩格斯，同上文）。而语言就是人类相互交换信息的第一个载体。语言成为一种把人们互相连结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系统”，所以语言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最早社会的产生。语言既然是一种信息载体，就注定必须是一种可以作单位分析的、有组合规律的、能发展演化的、在人类社会中不可一日一时终止的发音结构体。

“中国猿人”的活动大约延续了二、三十万年之久，后来，由于人口增多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有的虽然仍旧坚持在原地区流动，有的则转徙他方。这样，一直到“古人”阶段，其“群体”愈多，其足迹也愈远。在中国境内，今天发现的“古人”骨骼化石，如北方有山西襄汾的“丁村人”，阳高的“许家窑人”，内蒙伊克昭盟的“河套人”，南方有湖北的“长阳人”，广东韶关的“马坝人”等等（据研究，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确属北京人后裔）。这时，由于还没有定居，不同的群走不同的路，在语言方面，虽然“母语”是共同的，却逐渐发生不同的因素，这样一直到“新人”阶段。

中国大陆是蒙古人种主要发祥地的一部分。新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在体质上虽然原始性质已接近消失，但也还没有分化出定型的人种来。比如，继中国猿人之后，在华北地区活动的“山顶洞人”的体质也只是具有较清晰的蒙古人种性质而已，活动在四川地区的“资阳人”^②、广西地区的“柳江人”也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种的性质。据研究，山顶洞人的某些特征比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北方类型和美洲类型，柳江人的一些特征却比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这就是说，在已经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居民遗骸上有人种上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在旧石器晚期的“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类型中就已经存在某些南北异形现象，这样发展成为体质上更接近现代原住居民的新石器时代各地方类型。这种演化基本上是在同一人种主干、同一水平上发生和发展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西方人种在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成分中起过什么作用。中国新石器文化就是在这样相对单纯的人种学基础上产生的，它对此后中国远古文明持久稳定的发展起了

重要的作用。(潘其凤、韩康信, 1980)

用与山顶洞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测得的放射性碳素年代为距今约一万九千年(过去估计为十万年左右)。要想探索我国现代各民族的种源历史, 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2 《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和《中国语言区域图》

我找出两幅地图: 一幅是尹达先生 1963 年所写《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附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一幅是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位先生 1936 年所编《中国分省新图》(申报馆发行)中的《中国语言区域图》。前一幅图当然无法登记最近二十多年来所发现的遗址及其分析研究, 后一幅图既粗略, 又古老。两幅地图所反映的时间, 前一幅是一万年前, 后一幅是现代, 相距很远; 两幅地图所反映的内容, 前一幅是史前文化, 后一幅是现代语言, 性质也不同。尽管这样, 拿两幅地图仔细对比着读, 仍然可以看出两幅图上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可以互相叠合的区域分界线。

最北边的“细石器文化”, 包括“红山文化”和“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在内,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和新疆一带。这个区域的东头是“满-通古斯语族”, 中间是“蒙古语族”, 西头进入“突厥语族”区域。细石器文化覆盖区本文不打算讨论, 但必须说明的是“细石器工艺”, 据研究大概起源于中原地区, 不是外来的(安志敏, 1978)。细石器文化的南边是“仰韶文化”, 包括它西头后起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的东头是“龙山文化”, 一直延伸到渤海和黄海之滨。龙山文化西边一部分跟仰韶文化叠合。似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区域连起来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汉语北部方言的北方话区。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北边边线上大体就是后代长城的走向。龙山文化的南边是“东南地区原始文化”, 一直达到海南岛和台湾省, 还包括北头的“良渚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有侗台语族的壮语、侗语、水语、毛难语、仡佬语, 苗瑶语族的苗语和瑶语, 以及海南岛的属于侗台语族的黎语和台湾省的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高山语。汉语则有江淮话, 徽州话、客家话、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

1.3 云南和西藏的新石器遗址

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遗址图上不再标出分布区域。例如“西南地域原始文化”只标出贵州的一个遗址、云南的四个遗址。实际上, 云南新石器文化遗址, 截至 1977 年就已经有勐腊、景洪、孟连、云县、腾冲、昆阳、晋宁、安宁、昆明、禄丰、弥渡、大理、下关、宾川、大姚、元谋、鲁甸、昭通、大关、永胜、洱源、剑川、宁蒗、维西、福贡等二十五处; 另外, 元谋还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7)。西藏地区只标出黑河细石器遗址一处。实际上, 北部的申札、双湖、和南部的聂拉木也都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 南部的林芝、墨脱等地都发现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代表的晚期新石器遗存; 东部的昌都, 卡若发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其中除细石器外, 还有磨制石器、骨器、跟陶器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件宽带三角折线纹彩陶罐, 是新石器晚期遗存。——这说明西藏自治区跟祖国其他地区一样, 有新石器文化分布, 而且跟中原地区有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安志敏, 1979)。可见我国先民从远古起就已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他们所说的语言演变为今天的藏语。

1.4 藏语族人民的迁徙路线

西藏自治区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区，此外，藏族还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从现代藏族体质特征看，藏族属蒙古人种；从语言特点看，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语言学界对这一提法持不同意见的还不多见）。在体质上，从一种原始人，比如“山顶洞人”型的，如何逐渐分化出定型的藏族的过程；在语言上，从一种原始语，比如原始汉藏语，如何逐渐分化出藏语的过程；两者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从华北平原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着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并且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为藏缅语族，则似乎是可以这么说的。

1.5 云南民族及其语言的情况

我国少数民族目前已经识别并确定民族成分的就已经有五十多个，其中居住在、或部分居住在云南的就有二十一个。云南大概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复杂的省。云南东与贵州、广西相接，北与四川、西藏相接。云南居民民族成分最复杂这一现象，对研究我国史前民族迁移的走向问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从语言系属上来看一看云南的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有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白、藏、景颇、怒、独龙、阿昌、普米；属侗台语族的有壮、傣；属苗瑶语族的有苗、瑶；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崩龙、布朗。另外，云南蒙古族已经说彝语，回族已经说汉语。二十一个民族中，我们已知藏、回、普米、蒙古、苗、瑶等族进入云南的时间比较晚，其余都是云南境内的早期居民。1.3节所述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数也就在彝族的居住区，其次就在傣族的居住区，再其次就在傈僳族、纳西族、怒族和白族的居住区。尽管遗址的古居民不一定在种族渊源上与现在的居民有关，但是从一部分地名看，就可以知道现代居民从很早的时代起就已经住在这里了，比如勐腊、景洪、孟连，这些地名都是傣语。

1.6 侗台苗瑶语族人民的迁徙路线

侗台语族语言的分布情况是：在云南北西端的德宏傣语与南端怒江、澜沧江、元江下游的傣语连成一片，并远出国境；东端壮语又与广西壮语、贵州南部布依语相接；而贵州东南的侗语又与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的侗语相接；广西壮语又与海南岛黎语隐隐相连。其语言演化情况以及史前民族迁移之迹，是值得注意的。

苗族约在明朝初年从贵州迁入云南，现在分布于云南东部自北而南地带；瑶族约在元朝从广西迁入云南，现在分布于云南东南一带；两族并远出国境。而在唐宋时代，苗族分布于湘西至贵州境内，瑶族则分布于湘西南与广东、广西境内。

苗瑶语与汉语的关系，严学宥教授曾有论述（严学宥，1983）。

看来侗台、苗瑶各族迁移的走向，自北而南、再自东而西的痕迹是比较清楚的。

藏族中的一部分沿横断山脉入云南约在唐代，其自北而南的走向，也是比较清楚的，但其他藏缅语族人民的入滇时间当早于唐代。

二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及其居民

2.1 仰韶文化及其居民体质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先驱，是

原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年代都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安志敏, 1979)。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 延续时间有两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分布以黄土高原为中心, 遍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以及甘肃东部和湖北西部。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 除粟类作物外, 还种植蔬菜。定居生活比较稳固, 已经形成大规模的聚落。大的聚落遗址竟达到好几十万平方米。房屋建筑一般仍为半地穴式, 但也有平地建筑的方形房子, 根据柱洞分布情况可以推断是“人”字顶两檐式平房, 可见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平房建筑, 这时已经出现(如西安半坡遗址)。

关于仰韶文化居民的体质, 人类学家采集了陕西渭河流域如宝鸡北首岭, 西安半坡, 华县元君庙, 华阴横阵四个遗址氏族公墓出土的人骨, 把它们分作四组进行过研究(潘其凤、韩康信, 1980), 认为在种系特征上, 他们跟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支系比较接近, 而且接近南亚支系的程度还要高一点, 跟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也比较接近。四组之间无论在形态比较上还是统计分析上都反映了这四组仰韶遗址居民都属于相同的体质类型。

总之, 在公元前四至五千年左右, 生活在渭河流域的人们具有中、高颅, 中等面高和面宽, 偏低的眶形和较阔的鼻, 中等身高等特征, 依文化性质称为“仰韶人”的, 大概就是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的居民(潘其凤、韩康信, 1980)。

2.2 大汶口文化及其居民体质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和苏北, 并且延伸到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和辽东半岛一带, 大体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大汶口文化具有本身特点, 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即典型龙山文化)的先驱; 而分布于淮河流域与山东南部的青莲岗文化似乎又是大汶口文化的先驱(安志敏, 1979)。但是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却受到仰韶文化的浓厚影响, 其晚期深入河南中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问题。人类学者曾就山东宁阳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和江苏邳县大墩子三个遗址墓葬人骨提出研究报告。有的同志认为: “大汶口组的体型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在亚细亚人种支系中与玻里尼西亚人种组群较为接近。与蒙古人种新石器各组相比, 玻里尼西亚人在人类学分类中属于蒙古人种, 但与赤道人种混合”(颜闾, 1972)。并且认为: “西夏侯组的种族类型与大汶口组基本一致, 均属蒙古大人种中的玻里尼西亚类型”(颜闾, 1973)。有的同志认为: 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形态上的比较, 因此不同意把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居民归入玻里尼西亚人种, 根据对大汶口文化居民头骨的形态比较和种系亲疏关系的生物统计分析, 证明大汶口文化居民和仰韶文化居民在体质上的联系比和现代玻里尼西亚组群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 而且玻里尼西亚人颅骨上有代表性形态, 在大汶口文化居民颅骨上无此表现; 而大汶口与仰韶组群之间, 在颅骨形态特征方面却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潘其凤、韩康信, 1980)。这个结论可能是合乎实际的(参看王世民, 1981)。

潘其凤、韩康信两同志说: “虽然中石器时代的证据比较薄弱, 但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上仍然可以观察到新、旧石器时代居民之间的体质人类学上的承袭关系。例如中原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般具有较阔的鼻型, 不高的面和明显的齿槽突颌等, 跟现代南亚人种或赤道人种有比较相近的性状。但是如果说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两个人种主干的混血, 那是没有根据的; 要说中原新石器时代居民是由南方向北方迁移来的, 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这些特征组合是旧石器晚期人类同类性状的继承

(潘其凤、韩康信, 1980)。

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距今约6500年), 有一种拔牙风俗。据研究, 这种风俗发生以后, 可能沿黄河、长江之间向西南方向传播到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居民中, 并一直保留到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些少数民族中; 向南则传到史前江南居民, 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传到珠江流域, 可能在不晚于早商时期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的史前居民(韩康信、潘其凤, 1981)。

从前唐兰先生曾经提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的少昊文化遗存(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见《(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后来潘其凤、韩康信两同志在分析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种系问题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在黄河下游今鲁南苏北地区的居民, 有更高的颅, 较高的面高和较阔的面, 身材可能比仰韶人略高, 并伴有头部人工变形及拔牙风俗。依文化性质称为‘大汶口人’, 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潘其凤、韩康信, 1980)。仰韶人和大汶口人这两类新石器居民的文化性质和风俗习惯虽有差别, 但他们在体质上可能属于同一种系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因为较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体质跟这两个族群都有较接近的关系”(潘、韩同上文)。

2.3 古东夷集团、古僚族和仡佬族的拔牙风俗

古代文献上所记载的拔牙风俗都限于华南地区, 特别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僚族和仡佬族(韩康信、潘其凤, 1981)。仡佬族现在居住于贵州遵义、仁怀、清镇、平坝等县以及广西隆林等县。经研究, 仡佬语应属侗台语族(贺嘉善, 1982)。《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引天启《滇志》(卷30): “土僚, 其属自蜀、黔、西粤之交流入滇, 亦处处有之。”并加按语说: “《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已载夜朗地区有‘土僚’, 《魏志》卷100《僚传》载东晋时僚自牂牁北入蜀, 蜀中始有僚人。元代叙州南、乌蒙北一带土僚有打牙之俗。”又一按语云: “李京《云南志略》说: ‘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马可波罗游记》称之为‘秃落蛮’。近代‘土老’即‘土佬’, 又称‘仡佬’, 在文山的自称‘布僚’, 在红河洲的自称‘僚门’, 在金平、元阳的自称‘僚德’。广南、富宁二县的土族亦称‘土佬’。此外, 富宁有自称‘隆安’, 富宁、马关、广南等县有自称‘布雄’(他称‘黑衣族’)等壮族支系。”又一按语云: “《新唐书·南蛮传》所称‘西原蛮’即今广西左右两江流域至云南富宁、广南一带的壮族。本传又称西原蛮为僚。”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僚族跟仡佬族的关系, 还可以看出僚族跟壮族、傣族的关系。

拔牙风俗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的古居民中, 包括大汶口、屈家岭、马家浜、良渚等文化居民中和华南印纹陶文化居民中都有过广泛的流传(韩康信、潘其凤, 1981)。要是把历史文献上的记载接上去看, 则还要从广西延伸到贵州, 再延伸到云南。有拔牙风俗的人民的这种地理分布上所显示的“走向”, 刚好是侗台语族人民在分布上所显示的“走向”。而大汶口早期文化居民大概就是历史上的东夷集团。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想, 历史上的东夷集团的语言就是后来逐渐演变为侗台语族的一种语言。

2.4 侗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之间的关系

在前头(2.2)我们说过, 拔牙风俗“可能在不晚于早商时期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的史前居民”。台湾省的最早居民是高山族, 他们的语言现在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

族。在语言学界,有人找出侗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之间的发生学上的关系(Paul K. Benedict, 1975)。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他说侗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恐怕可能性不大。

2.5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

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华南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类学者从遗址第三层的两具完整的头骨观察,除具有一般蒙古人种的形态外,似乎还兼有某些现代赤道人种相似的性质,长头,低面,宽而平的鼻骨等特征很明显,没有发现拔牙的痕迹。河姆渡人很可能代表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而有别于中原的古代种族。时代很晚的广东佛山河宕、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增城金兰寺这些滨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跟河姆渡人可能有比较多的接近关系,但是这三处遗骸上都有拔牙风俗的痕迹。广西桂林甑皮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遗骸与半坡组非常接近,而与上述河宕、昙石山、金兰寺等组较疏远。但甑皮岩组的偏低的颅高、低面、特别是很大的头骨水平矢径和长颅形特点,则与黄河流域的仰韶人、大汶口人不一致,在颅形上倒很可能跟华南的长颅类型比较接近。传说中的苗蛮集团大概跟这种长颅形有关(潘其凤、韩康信,1980)。

上古居住在南方的人都被称为“蛮”族(范文澜,1949)。其实“蛮”是上古苗瑶族的自称——*mlwan* (平),其义为“人”(李永燧,1983)。汉语“蛮”字的上古音为**mran* (平) > *m* (*w*) *an* (平),但“蛮”字从“𧈧”声,上古音可拟为**mlan* (平)。如果汉语和苗瑶语两方面的拟音都近似实际的话,那么汉语和苗瑶语的发生学上的关系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了。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按指彭蠡湖)荆州数为乱。”江淮荆州大约指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的长江一带和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广大地区。但这是有史以后的情况。史前时期可能居住长江下游地区,曾联合不少部落北上与炎帝族、黄帝族作战,失败后,退回江淮荆州(范文澜,1949),并向南方和西南迁移。现在苗族居住地区主要在贵州,还分布于湖南、云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北等省;瑶族居住地区主要为广西,还分布于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部分苗族在明朝初年从贵州迁人云南;瑶族约在元代从广西迁人云南。

2.6 汉族大量迁入闽粤的时间

有的同志说: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数省是印纹陶散布范围,也就是百越族散布范围;所以印纹陶应该与百越族有关,再加上石磷多于石斧,而且还有有段石磷,都是东南地区的特征,说明这一地区民族与华北不同。福建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也应是古越族。这一族自汉朝以后和北方来的汉人混合同化,到了唐代便没有纯粹的越族,已经完全融合于汉族(林惠祥,1957)。“百越”这个词反映着古代对复杂的东南地区原始居民的笼统认识。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新石器遗存包含了至今还不清楚的各种原始文化,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表现了一定的地区性,晚期遗存则表现了跟长江、黄河流域的较大的一致性。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晚期有从北方迁来的一些种族,例如有拔牙风俗的种族。不过就是在早期,其粗陶上的绳纹、篦点纹也与中原地区一致(例如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有段石磷和几何形印纹陶等等,的确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正如不少学者所说,是百越人的文化遗存。关于古越族,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的《百越民族史论集》一书有较细致的论述。不过在河南临汝煤山遗址(是河南龙山文化

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也发现了五件有段石锛(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2)。至于林惠祥先生所说(1957),古越族与汉以后南来汉人混合同化而成今日的福建人,可能性不很大。第一,从语言上看,闽语、粤语之为汉语方言是不必争辩的事;第二,汉人从唐宋以后才逐渐大量从北方迁来(从语言上看,汉人入闽的时间当早于入粤时);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迁来的人口并不太多。就广东说,北宋时非汉族居民仍然远远超过汉族。如神宗元丰三年(1018),广南东路编户的非汉族约占十分之六、七,汉族约占十分之二、三(容观琼,1983)。韩愈《送区册序》说:“阳山(按在粤北连江东岸),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民居,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写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鸟言”是唐代北方人对当时粤语的听感;“画地写字”然后可通,证明粤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当然秦汉前后北来的汉人与古越族混合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其结局恐怕只能是“越化”了。

三 古东夷族与现代侗台语民族

3.1 龙山文化与夏代文化

在北方,继仰韶文化兴起的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遍布山东、河南、陕西各地,但是文化面貌上的地区性很强。河南安阳后岗遗址有三个文化层,最下层是仰韶文化,最上层是殷商时代的小屯文化,中层是龙山文化。从好些遗址看,都显示着仰韶文化逐渐过渡为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看来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来的,其承接关系极为密切,以致于难以划界,而其器形与河南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差异,其分布以山东为主,向西到河南,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其他分布地区为渤海、黄海、东海的滨海地区。而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区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黄河两岸。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分布情况来看,它们应当是两种地区性文化。《孟子·离类》上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氏注:“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诸冯在今山东诸城县,处黄海之滨,所以龙山文化,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当与东夷有关。

山东龙山文化之所以与河南龙山文化有差异就在于两者所承不同。山东龙山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自身的发展,而河南安阳龙山文化则是仰韶文化吸收了典型龙山文化所形成的新文化。其后又吸收了其他的地区性文化(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青铜文化)而形成夏时的文化(参考邹衡,1980),再进一步就发展成殷商文化和周文化。

3.2 汉语的初始形式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大抵文化相承,必有损益。即以甲骨文而论,其前当有雏形,殷承而损益之,使它进一步条理化。甲骨文的出现,说明这个时候汉语的初始形式早已出现。这种初始形式的汉语,方言芜杂^①,可以想见,而殷商渐次加以统一。到周王朝,十五《国风》采自异地,而用韵井然有序;即使两周金石文字,如杞、郟、许、邾、徐、楚诸国之文,“上起宗周,下迄战国,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说明当时已经有标准语,即所谓“雅言”。可以说,汉语到这时已经定型。

夏代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了古东夷的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地区性文化。文化的

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部族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一个新文化的出现，常常是代表了一些新的部族”(安志敏,1956)。所以就是可以作为形成汉语初始形式的直接来源的语言,也不能称为“汉语”,这是不难理解的。而这种作为汉语来源的一种“母语”却早已消逝。如果要推想它的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量的现代有关语言的调查材料中分层上溯,加以构拟。构拟虽力求其合理,但不一定能如实。如果再证之以殷周文字及古代典籍,殷周去史前时期未远,或者可以从中得到“母语”消息。

3.3 古代夷族与后来的侗台语族人民以及汉族人民的南迁

一部分没有跟夏人融合的东夷人,比如大汶口人,在甲骨文字通行之前,渐逐向南方迁徙,离开了北方。他们的语言后来发展为侗台语族的语言(参看2.2和2.3)。

在“汉语”形成后,说汉语的人中间的一部分,跟原住北方的许多兄弟民族的祖先一样(除去细石器文化人),也逐渐向南方迁徙,约在唐宋时代到达广东,而在略早于唐宋时代到达福建。从现代汉语方言地理铺陈的序列上看,凡是迁得越远的,就越能保持语言的较古的或更古的形式,例如粤语和闽语。而史前的北方的汉语形成区,现在却已成为这一语言的音韵体系简化的最前线(在北抵湖南、南达广西的侗语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音韵体系上南繁北简的相同现象)。汉语方言由南而北的简化程度就连续递增的,如闽南方言、粤语有 $-k, -t, -p$ 入声尾,闽北方言,吴语只有 $-ʔ$ 入声尾,江淮方言只有入声调,北方话无人声调。看来这是汉语音韵本身的连续发展变化,不管是南头还是北头,都很难说成是受相邻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的结果^④。从地理的铺陈上,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投影。这样也就形成了上文1.2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上所见的情形: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区域连起来,大致相当于今天汉语北部方言的北方话区。

3.4 语言、文化的分化与融合

在农业经济兴起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过的都是非定居生活,转徙无常,去若逝水,浪迹天涯,不再回头。在语言、文化发展趋向上以分化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则以定居为常,在语言、文化发展趋向上则以融合(整化)为主。今天所能见到的新石器遗址已经分布于全国各地,说明国内各民族的祖先久已在所居停的土地上以不同程度的文化发展生产,与自然界作斗争,而在体质、文化、语言各方面也逐渐定型,慢慢形成今天的各民族。当然不能说现在各民族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固定在现在居停的地方;因为虽说是定居,但由于人口增加,天灾人祸,种种原因,有时仍不能不作或近或远的迁移。比如山东历城龙山镇遗址,黑陶人民在这里住了大约八百年,并且已经建筑城墙,终于以河流改道或其他原因迁徙,去向不明,此地因之荒废;若干年后,灰陶人民来,重新建设,居住了约三百年,终于又以某种原因迁徙,不知去向,此地因之荒废到今天(梁思永等,1934)。岁月消磨,有些古老种族业已绝迹,而今天的各民族中有的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种族。比如侗台语族人民对古东夷集团人民来说,应是一种新种族;而汉族对古华夏集团人民来说也应是一种新种族。

四 几个语言上的强证

有几个语言上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推想“东夷”集团跟现代侗台语族人民的关系以及汉语和侗台语族的关系。

4.1 爵与斝

《论语·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灌”也写作“裸”，是祭祀中的一种仪式，就是把鬱鬯酒泼在地上，以降神。酌鬱鬯酒之器叫做灌尊。灌尊之名，三代不同，形亦有异。《记礼·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实周郁乎文，监于二代，三器都用。《周礼·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秋尝、冬烝，裸用斝彝、黄彝。”早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第五期）鸡彝雏形就已经出现。其特征是球形腹，小头正对腹的中心，圆流，鸭嘴形三实足，后有一盘。猛一看，好像是一只刚出壳的雏鸡（邹衡，1980）。这大约就是当时或稍后时代裸礼所用的灌尊。其实山东龙山文化中的所谓红陶鬯，夏代文化常见的封口盃（如二里头遗址所见），以及早商文化之斝（三足双柱一盃），看来都是从大汶口鸡彝发展而来的。邹衡同志说：此器似鸡，而又流行于古东夷地区，故名曰“夷”。很有理致。

《诗·行苇》：“或献或酢，洗爵奠斝”。孔《疏》：“所洗所奠，犹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异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仪礼》饮觶者亦曰‘卒爵’，是爵为总称，作者因洗奠之别，变更其文耳。”夏代文化中期已出现陶爵。《说文》：“斝，玉爵也。夏曰斝，殷曰斝，周曰爵。”标准的陶爵最早见于河南偃师代表夏时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中，器身划纹，作羽毛状。河南龙山文化中已见爵形器，故爵当从东方传来，其最早形态也是从“鸡彝”分化出来的（邹衡，1980）。《说文》：“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雀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说文》：“雀，依人小鸟也。从小佳，读与爵同。”段注：“今俗云麻雀者是也。其色褐，其鸣节节足足。礼器像之曰爵，爵与雀同音，后人因书小鸟之字为爵矣。《月令》：‘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高注引《吕览》曰：‘宾爵，老爵也。棲宿于人堂宇，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按：《月令》郑玄注及近人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俱读作“鸿雁来宾”，似误。）

礼器之爵，用以酌鬯酒。《说文》：“鬱，芳草也。……一曰鬱鬯，百草之华，远方鬱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段注：“许意古书云‘鬱人所贡’，即鬱林郡地之人也。……《地理志》：‘武帝元鼎六年，更名桂林郡为鬱林。’”三代灌仪，源于远古，而在《说文》所引古书出现的时候，最初使用灌尊及鬯酒以降神的民族，就已经远徙到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了。某些古越族的来源也当与此有关，试看“鬱”，“越”两个字的上古音：

“鬱” *?wjet > ?juet > 广州 wət

“越” *gwjat > jwət > 广州 y:t

关于古越人语言的研究，韦庆稳同志（1980）曾作了一个良好的试探。

我们再看“爵”（雀）字的上古音：

“爵”（雀） * tsjakw > tsjak > 广州 tsœ:k⁷

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广西龙州壮语“麻雀”说作 tso:k⁷，而这个词也有“杯子”的意思；云南傣仂语“麻雀”tsok⁷，也有“杯”义；国外傣语“麻雀”说作 ka-tso:k⁷ (kra-tso:k⁷)，这个词也有“高脚杯”的意义。

《明堂位》郑玄注：“斝，画禾稼也。”证之以今天的田野发掘所得，知为臆说，但斝与稼同音，则是事实（注云：“斝音稼，又古雅反。”）

“罍，假（古雅切）” *krar > ka > 广州 ka³

“罍，稼，嫁，價” *krar' > kə' > 广州 ka⁶

罍器既从鸡彝发展而来，当与鸟形有关。我们从泰语可以看到这种联系：泰语“鸦”说作 ka¹（龙州壮语 ka¹，剥隘壮语 ?a¹），但这个字又有“壶”的意思。

汉语“鸦” *?rar > ?a > 广州 a¹

《广韵》马韵：“假，古疋切，《说文》又作‘假’，至也。”《方言》（第一）：“假，徭，……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或曰徭。……皆古雅之别语也。”又说：“嫁…往也”。傣仂语谓“去（假）”为 ka⁶。泰语谓“價”为 k'a⁶，傣雅语、布依语、依语则为 ka⁶，但壮语为 kia⁶。壮语谓“嫁”为 kia⁶，傣雅则为 xa⁶。泰语谓“稼”为 kla³，壮语为 kja³，傣仂则为 ka³，剥隘为 tca³。汉台两语的这些同源字的音义之间的联系，结合古器物、古民俗来考虑，其远肇于东夷，隐约可辨。

4.2 封与埋葬

关于墓葬，《说文》有“塋”字（方邓切）：“塋，丧葬下土也，从土，朋声。《春秋传》曰‘朝而塋’，《礼》谓之‘封’，《周官》谓之‘窆’。”《礼记·王制》：“不封不树。”郑玄注：“封谓聚土为坟。”

“封” *pjuŋ > pjwŋ > 广州 fuŋ¹

“埋葬”泰语谓之 faŋ¹，龙州壮语谓之 p'aŋ¹，册亨布依语谓之 foŋ¹，当即“封”字。

4.3 虹与龙

“虹”是甲骨文中常见字，写作，《殷虚书契精华》（4.1）卜辞云：“辰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这里头大概包含着一个亘古相传的神话（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三页《释虹》）。

《诗经·邶风》：“蜺在东，莫之敢指。”《传》：“蜺，虹也。”《广韵》“蜺”有“德红”，“多动”两读，第二读中古音为 tuŋ²。“虹”字《广韵》“古巷切，又音红”，中古音为 kəŋ²，yŋ。泰语称“虹”为 ruŋ⁴，也说作 ruŋ⁴ kin¹ na:m⁴，直译就是“虹饮河”，与卜辞说法相同。广西三江侗语“虹”与“龙”都称为 ljoŋ²，“虹”也说作 ljoŋ² ta:n¹ nam⁴，直译也是“虹饮河”。贵州布依语绝大多数方言称“虹”为 tuŋ²，当与“蜺”字有关；少数称 eŋ²，当与“虹”字有关；还有称为 ɣu²的，ɣu²是“蛇”的意思。云南傣雅语称“虹”为 huŋ² va¹，huŋ²显然跟“虹”是同源字。

“龙”，龙州壮语称为 ɲə:k³，云南傣雅语称为 ɲə:k³，实际上都是汉语“鳄”字。《说文》写作“𪚩”，解云：“似蜥易，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也。”

“鳄” *ɲak > ɲak > 广州 ɲə:k³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和安阳殷墟都曾发现鳄的腹部骨板。1979年在王因遗址中发现有可以肯定为扬子鳄的比较大的标本（周本雄，1982。）扬子鳄或称为“鼉”，俗名“猪婆龙”。“鼉”字甲骨金文都有，就是这种动物全身披甲的古象形字。《说文》：“鼉，水虫，似蜥易，长丈所，皮可为鼓。”（依段注校补）《诗大雅·灵台》：“鼉鼓隆隆。”1934—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大墓曾出土鼉鼓以及鼓架的实物。扬钟健先生曾提出殷墟甲骨文中的龙都是鳄的形象。并且认为所谓龙者，就是当时人民所见的蛇与鳄等爬行动物，后来被神化，其时约在周以后，因为鳄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历史初期，在中原地区逐渐稀少，乃

至绝迹了(周本雄,1982)。壮语和傣雅语的“龙”的称谓,可以证明扬说是正确的。

4.4 帽

头衣称“帽”,汉语、侗台语、藏语同此一词,谁也没有借谁的。

《说文》:“曰,小儿及蛮夷头衣也。从门;二,其饰也。”段注:“谓此二种人之头衣也。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曰。荀卿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注:‘务读为冒,拘与勾同。’《淮南书》曰:‘古者有鞶而卷领以王天下者。’高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鞶者兜鞶帽,言未知制冠。’按高注‘兜鞶’二字,盖浅人所加。务与鞶皆读为曰,曰即今之帽字也。后圣有作,因曰以制冠冕,而曰遂为小儿、蛮夷头衣。”

“曰,冒,帽”**magw'*>*mou'*>广州 *mou*⁶

“帽”,泰语称 *mua:k*⁷, 傣仂称 *mo:k*⁷, 龙州及剥隘壮语称 *ma:u*⁶, 藏文为 *rmog* (兜鞶), 拉萨藏语称 *caAmoA*, 缅甸语称 *k'mauk*。

“帽”又称“务”,当是方言之异。

“务,雾”**mjag'*>*mju'*>广州 *mou*⁶

“雾”,泰语称 *mo:k*⁷, 龙州及剥隘壮语称 *mo:k*⁷, 藏文为 *rmugs-pa*, 拉萨藏语 *muk\pa*¹

小儿衣饰,常存古式,到清代还是这样。三皇以前,小儿头衣既与蛮夷相同,可见上世头衣,华夏集团与“蛮夷”无异,而且都称“帽”,可见“帽”是邃古蛮夷华夏未分之际的文化词语留遗。

以上所论的几个字,可以徵史前汉藏系语言的发生学上的消息。这种消息的获得,有赖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数十年前,有中国人种、文化西来之说;但我国各地史前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其源流的久远,层次的相承,井然可辨,足以证明“西来说”是一种妄说。后来的有关侗台族人民的“南来说”,以及“侗台语族与汉藏语无关论”,看来也缺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上的有力印证。所能证明的大体如本文所论。一得之愚,不敢肯定,谨求教于海内外师友之前。

【附记】 本文初稿承蒙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玉哲教授阅读,对本文所用的方法和所作的论证表示同意,但对原始工具制造问题及夏文化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已遵嘱修改,谨此致谢。

① 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人,一百万年前的陕西兰田人和芮城匭(*kē*)河村人,也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从文化源流上看,匭河文化从西侯度文化和兰田文化发展而来,而北京人的文化又跟匭河文化有密切关系;从体质上看,兰田人下颌骨和北京人相一致,所以,他们所说的跟北京中国猿人所说的应是同一种语言。

② 资阳人头骨化石是解放后七年多以来所发现的比较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更重要的是过去在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如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都在北方,而资阳人则在四川,可是资阳人头骨与山顶洞人和中国猿人都有某些相似的性质,三者可能具有一定关系。因此,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对研究中国人类起源和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分布问题都提供了新资料(裴中文、吴汝康,1957年)。

③ “方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一种原始语分化派生(包含融合)而成的好些后代

语；一个是用来跟已出现或将出现的标准语相对。至于上古方言芜杂，《荀子·正名》已有所论：“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见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皖按即“方言区”）则因之而为通。”[北齐]颜之推《家训·音辞》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米，固常然矣。”他举的例子是：“《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自楚辞之经。”近李方桂也说：“毫无疑问，周朝一定存在不同的方言，正如现代有方言一样。”（见Li 1983, *Archaic Chinese*）小屯文化中的甲骨文已经相当进步，绝非原始形态，没有仰韶、龙山二、三千年的创造提高过程是达不到的，而这个时期正是原始汉语形成时期。

④ 从汉、侗台（包括黎语，但除去水语）、藏缅（除夷语等）等语看，一般都是韵母比声母多，所以在音韵演化的流程方面，观察韵母（包含声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但是苗瑶语除勉语外则韵母比声母少，而声调多，看来这些语言的声调和声母似乎有一种补偿性发展。汉语方面，不少北方话的声母反比闽、粤等语略多，也是同样情况。

参 考 书 目

严学窘，1983：《为建立中国对比语言学而奋斗——在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南民族学院油印本。

——，1983：《苗瑶汉语关系词的层次》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

Frank Palmer, 1971: *Grammar*, Penguin Books Ltd (赵世开译,《语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裴文中、吴汝康, 1957:《资阳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甲种专刊第1号。

潘其凤、韩康信, 1980:《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1977:《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

安志敏, 1956:《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见《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 1978:《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见《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 1979:《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见《考古》1979年第4期。

——, 1979:《三十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见《考古》1979年第5期,又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1982,文物出版社。

颜 闿, 1972:《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见《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 1973:《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见《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王世民, 1981:《1980年的中国考古研究》,见《考古》1973第三期。

韩康信、潘其凤, 1981:《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见《考古》1981年第1期。

Paul K. Benedict,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HRAF press.

贺嘉善, 1982:《仡佬语的系属问题》,见《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

范文澜, 1949:《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

李永燧, 1983:《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见《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

- 林惠祥, 1957: 《福建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 见《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1982: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 见《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 容观琼, 1983: 《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 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 邹衡, 1980: 《试论夏文化》, 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1980, 文物出版社。
- 王国维: 《观堂集林》, 1927年排印本。
- 梁思永等, 1934: 史语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
- Fang-kuei Li, 1977: *A Hand 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 商务印书馆。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 1959: 《布依语调查报告》, 科学出版社。
- 周本雄, 1982: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骸》, 见《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西安半坡博物馆, 1982: 《西安半坡》。
- 尹达, 1963: 《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后收入尹达《新石器时代》一书中。
-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 1939: 《中国分省新图》, 申报馆发行。
-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1982: 《百越民族史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韦庆稳, 1980: 《越人歌的初步研究》, 见中央民族学院编《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一辑。
-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扫叶山房石印本。